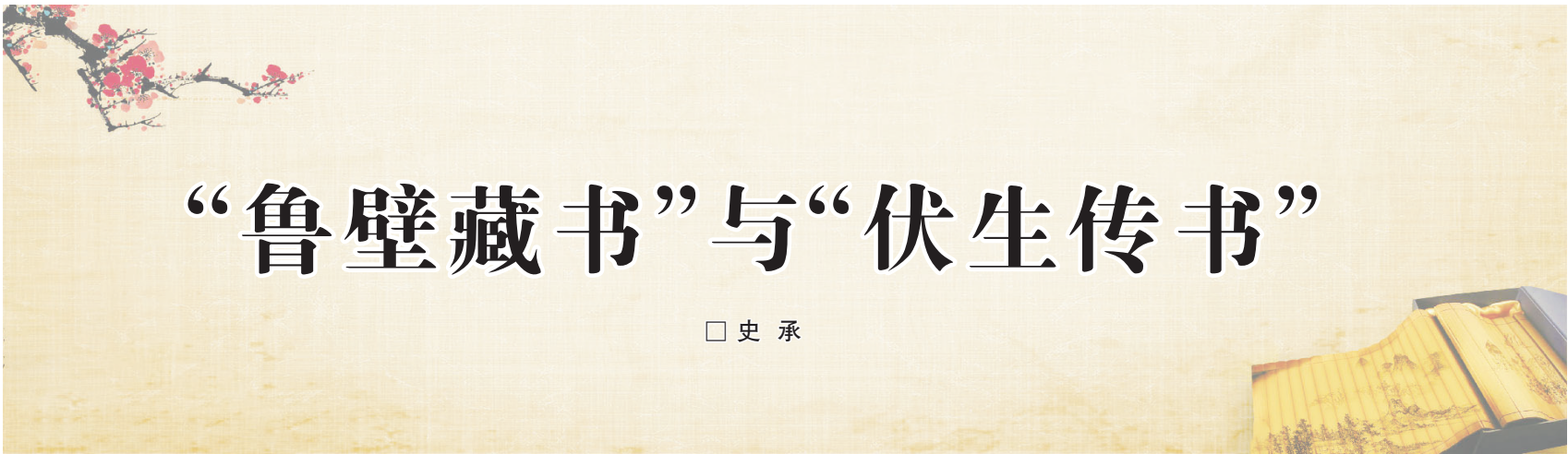




“鲁壁藏书”与“伏生传书”

□ 史 承

公元前213年，秦朝博士官们一次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引燃了秦始皇焚书的烈火。大秦帝国颁布实施《挟书律》和焚书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官私藏书“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开启了中国藏书史上前无古人的文化浩劫。

除了秦始皇，对中国古代典籍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还有项羽。当初秦始皇下令焚书，也不是说烧了个干干净净，什么都不剩。博士官所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并没有被烧掉。秦国的史书和那些从六国秘府缴获的许多珍贵典籍也都保存在咸阳官里，有专人负责管理，以供研究。

只是很可惜，秦始皇留存在咸阳宫的那些全国独一无二的藏书，在秦末乱世中，除萧何随军攻入咸阳时保留了一部分法律诏令和图书文献以外，其他部分又被后续攻入咸阳的项羽一把火给烧了。据《史记》记载，项羽在攻入咸阳城之后，一把火将整个咸阳城给烧了，大火烧了整整3个月而不止，这就烧毁了秦国的国家图书馆，烧毁了咸阳宫里那些珍贵的藏书。

既然秦始皇和项羽的大火差点就让《诗经》《尚书》、六国史记、诸子百家之书等消失殆尽，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能够看到这些著作呢？这些珍贵的典籍是如何逃过秦火和战火而传承下来的呢？

这得感谢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典籍藏起来、传下来的爱书之人。

在中国藏书史上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孔子的后裔孔鲋，一个是秦朝的博士伏生。他们两个办了中

藏书史上至关重要的两件大事：一个是“鲁壁藏书”，一个是“伏生传书”。

我们知道，孔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私人藏书家，为了教学和编书的需要，他曾经派他的学生子夏等人搜集了百二十国宝书。《诗经》是从他收集到的3000多篇文献中选编而成的，《尚书》也是在3000多篇文献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所以孔子传给其后人的书籍是非常多的。而这在秦始皇颁布《挟书律》之后，却成了孔子后人最大的危险所在。当时，这个危险就摆在孔子第八代孙孔鲋面前。孔鲋从小随父学儒，用心刻苦，精通“六艺”。他特别喜欢读书，经常徜徉在文献典籍中，沉醉于“先王之政”的美好图景。而且，他也和孔子一样聚徒教学，其中有一个学生就是后来为汉高祖刘邦制定礼仪的叔孙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鉴于孔家的名望和孔鲋的学识，就封孔鲋为文通君，并征召他为咸阳博士。但是孔鲋婉言谢绝了，不愿出仕为官，只想安安静静在家教学生、搞研究。但是，天不遂人愿，岁月难静好。秦始皇三十四年的一天，孔鲋的一个朋友惊慌地跑过来对他说：“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秦始皇要把有关先王的书都烧掉，而您是这些书籍的主人，如果不把书交出去，很危险啊！怎么办呢？交出图书，于心不甘；不交出去，又有生命危险。孔鲋思来想去，决定冒险保卫藏书，以待将来。他按规定交出一些无关紧要的竹简书，而将先秦《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最宝贵的古籍，藏匿于精心修筑、中间掏空的墙壁夹层内。孔鲋精心安排好藏书之后，就逃至嵩山隐居，并继续教授弟子百余人。不过他严守藏书的秘密，没有对任何人透露。不久，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起义了，他们发出“天下苦秦

久矣”的呐喊，点燃了反抗暴秦的熊熊烈火。当时，除了六国后裔投身反秦事业，一些儒生也因为“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纷纷投奔义军，这里面就有孔鲋。不幸的是，孔鲋在跟随起义军反抗暴秦的过程中去世了，但是因当时秦朝未亡，焚书令尚存，所以孔鲋至死都没有跟别人吐露藏匿古籍之事。

直到汉武帝末年，喜欢奢华生活的鲁恭王刘余想要在鲁地扩建宫室，因为鲁恭王的宫殿与孔子故居相邻，于是鲁恭王就跑到孔子故居搞强拆。据说就在孔府的墙被强拆的时候，众人忽然听到天空传来金石丝竹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鲁恭王听了有点害怕，不敢继续拆了。正在大家惊奇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墙壁中间发现一大批用古文字蝌蚪文撰写的古籍。其他人们都不认识这种古文，只有孔氏后人孔安国能够辨别。他进行系统整理，发现都是上古流传的儒家经典，因为它们是用古代的蝌蚪文写成的，所以就叫“古文”经典。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这是一件对中国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些典籍能从秦始皇焚书的浩劫中保全下来，弥足珍贵，其意义堪比文艺复兴时古希腊文献的发现。这就是“鲁壁藏书”的故事。

除了“鲁壁藏书”，对中国藏书史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伏生传书”。

其实不仅是孔鲋在藏书，当时许多儒生面对这场文化浩劫，也都在尽自己所能保存文化火种。当时任秦朝博士的伏生也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暗自抄录《尚书》，将其藏在自家墙壁夹层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尚书》最早的书名就叫《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

伏生其实是叫伏胜，“生”是古

人对“先生”的尊称。前面讲过，秦朝的博士官为了工作需要是可以收藏诗、书和百家语等书籍的。伏生也算是利用职务之便办了件大好事。当时正值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相争之际，为逃兵火，伏生只好将自己抄录的《尚书》藏于故宅墙内，外出避难，待秦亡汉立，天下初定，伏生再回家挖开墙壁，却发现当初藏在那里的书简很多已经朽毁，完整篇目仅余28篇，也有人说是29篇。伏生就用这剩下的二十八九篇在齐、鲁之间聚徒教学。因此齐鲁两地的许多学者都研究《尚书》，渐渐在全国都很有影响了。伏生抄写的《尚书》，是用当时通用字体隶书记录，所以叫“今文尚书”。随着儒家学派逐渐复兴，伏生壁藏《尚书》并将其传播的事迹传到朝廷，汉文帝非常重视，想要召他进朝，但此时伏生已经90多岁了，不能出行。于是汉文帝派当时掌管礼乐制度的官员，太常掌故晁错到山东章丘伏生家里当面学习。晁错将伏生传授的《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补叙出所失篇章，才使《尚书》得以流传下来。

孔鲋、伏生的护书传书，使得《尚书》等重要的儒家典籍得以传之后世，为华夏文明的薪火相传保留了火种。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孔鲋、伏生那样的人拼尽全力的保护，典籍承载的文献才得以传承，中华文化才得以接续。正如明清文化名人金古良在《南陵无双谱》诗中所赞：

尘器上竟焚书，
劫后壁藏方有余。
皓首传经众人叹，
蓬门积德万年欤？



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影响深远，此文大量史料来源，则来自于江南无锡乡间史学家计六奇所著的《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明季南北略》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明清之际的重要史料，特别是保存了丰富的农民起义史料。

生于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的无锡人计六奇，字用宾，号天节子，别号九峰居士。他的原籍在江阴，后来迁徙到了无锡的兴道乡（今前洲街道境）。计六奇出身在一个江南没落富庶人家，到他这一辈时，家境已经较为清寒，故年少之时常寄读于邻人的私塾里。他在《明季北略·岁饥》中说：“是时比年旱歉，谷贵人饥，予随内父（岳父）杭济之先生读书于洛社。予于杭氏斋中，每啜豉粥。”

计六奇的父亲是无锡乡间较有远见的读书人，他曾到过南昌、滁州等地，交游中结识了不少好友，眼界视野因此得到拓展。他常常给计六奇讲述在各地所见所闻之事，如袁崇焕宁远保卫战、吴适任南都户科给事中刚正不阿的故事。这些逸事逸闻，给求知欲正盛的计六奇带来难忘的印象。

计六奇的岳父杭济之也是个十分留心著述的乡间读书人。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八《李自成入荊州》至《梁玄昌家难》五篇及卷十九《宋光祖贼伤》至《三藩贼祸》即采之杭济之的手记。史学家王崑据《明季南略·卷四·王献之不屈》推论，杭济之父亲“雋州牧，高才博学，资志以歿”。他的异母弟王谋（字献之），排行老三，幼嗣无锡南门王氏，遂因王姓。崇祯己卯、庚辰（十二、十三年）之际，训蒙洛社，移家居蜀，其时他常常过杭济之的书斋清淡。

崇祯十五年（1642年），20岁的计六奇跟随岳父杭济之读书于他的舅父胡时忠家。胡时忠是明末官吏，当过南昌府推官，参与处理过当时抚州、新建、奉新一带的民变，后来擢升为监察御史，与曾櫻、黄道周等晚明名臣来往颇洽。因有京师和地方从政的实际经历，又饱经宦海沧桑，故立论笃实、见地卓尔，其所著《孔庭神在录》《冷斋香集》等诸书，使得计六奇了解到许多官场秘闻，影响着他对当时明末朱氏王朝的观感。在《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中，他屡屡地提及舅父给他的知识与影响。而书中征引邸报之类，就是出自舅父所藏。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即农历甲申年，22岁的计六奇亲身经历了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推翻朱明崇祯王朝。接着又是明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荡平农民军，鼎立清室。第二年清军又南下，先后发生了史上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当时在江阴疏垞乡（今江阴徐霞客镇境）教私塾的计六奇，亲身经历了膏腴之地瞬间成为废墟，尸横遍野。明清鼎革所激起的血雨腥风，让他既对明室的昏庸无能感到叹息，又对清军骄横暴戾激起的反抗抱以极大的同情和崇敬。他在《明季南略·总论起义诸臣》所录杨廷枢“祇今浩气还天地，方信平生不寄然”的绝命诗，正是他内心所思的写照。

清顺治三年（1646年）冬十一日，杭济之的弟弟、计六奇的好友王谋起义抗清，“率乡兵万人，夜薄郡城，积苇焚门”，兵败被杀。计六奇身边亲人、学侣大义凛然的抗清斗争，虽因力量的悬殊而失败，但百折不回肝脑涂地的民族气节，深深激发计六奇的民族责任感，他在《明季南略·总论起义诸人》中由衷感叹：“至是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知识，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之百万，亦安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作为学侶，王谋反清义举对计六奇影响深远。

清顺治六年、十一年，27岁、32岁的计六奇先后两次应试于江阴、镇江。两次虽未中第，但考场士子以诗文反清、海外孤臣知其不可为而九死不悔的气概，更深深激励着计六奇，他决计放弃入仕的念头，走上著史彰义的道路。

对广泛搜集积累来的材料进行深切解读，不断对身处明清两朝兴替时代的深刻体验与思考，经过长期系统的准备，计六奇开始著述《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据《跋》所说：康熙壬午申酉（1666至1669年）之际，作《南北略》两书，具草五百余篇，至庚戌（康熙九年）二月六日开始重新抄写改正两书，到了第二年辛亥农历四月十

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

□ 陈永跃

历史文化典籍



六，《北略》完成。五月十五甲午，重新改写《南略》，按日完成预定的课篇。在《志感》中他这样回忆：“予缀草四载，膳次二年，始得告竣，未审当世有知我者否？”对于自己倾尽心血所作两部著作，计六奇不是简单地罗列搜集来的材料，而是认真地分析选择，努力通过史料还原当时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他在所述史料下，尽量注明来源与出处。于有疑处，则笔记以待后者详考。

长期辛勤的著述，使得计六奇视力受损，但他始终不改初衷。他在《志感》中说自己“身居贱末，不附青云之士”，身在穷乡僻壤，但他并未忘记读书人责任，倾心著史，表彰忠义贤士，退谄势利熏心之小人，“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李慈铭说：“《南略》所记多为亲历，以闻见较亲，故大端无误。”

计六奇一生由读书再教书，始终为一穷秀才。他身处清朝统治下的文禁时代，他虽然有此恢宏著述，亦不能刊刻流布，以至于他的事迹也不为世人所知。甚至他的具体卒年也无法详考。现在人们仅仅依据他在《明季南北略》两书中手记，得知他在66岁时，依然能激扬文字，健笔著述。他在《自序》中说：“国家之兴废，贤奸之用舍，敌寇之始末，兵燹之絀盈，概可见矣。”

据史学家任道斌考证：“《明季南北略》虽成书于‘康熙十年’，然而清初的文禁使他被列为‘禁毁书目’，一直不能付梓。直到嘉（庆）道（光）间文禁稍有松弛，才有北京琉璃厂半松居士木活字本刊行于世。尔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海图书集成印刷局刊行石印巾箱本；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刊行铅印本，风行百余年。”

计六奇卒后其书虽然最终得以刊布，但这些刊印的版本因为文禁的原因，大都经过了大量的删改，不是他原来的版本。书中的有些章句难以卒读。直到1956年张盦先生在上海熏阁发现了清初抄本。抄本不仅多出七八万字、60余条，而且编排有序、标题清晰，订正了通行版本中的许多讹误，恢复了诸多因避讳当时执政者而删除的文字。《明季南北略》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明清之际的史料，特别是保存了丰富的农民起义史料。相伴于计六奇所著《明季南北略》的流布，使人读其书而崇尚其大义，尚其大义而想为其君子，并想见其人。

北宋发明家燕肃： 被李约瑟誉为达·芬奇式人物

□ 燕 翔

我国北宋时期，科技人才辈出，成就灿烂。论及科技贡献，当首推燕肃。燕肃，北宋益都人，精通天文历法，博学多艺，不仅绘制了《海潮图》，撰写了《海潮论》，还先后研制成功了指南车、记里鼓车、欽器、莲花漏等发明。其父峻慷慨任侠。肃举进士，累官礼部侍郎致仕。性精巧，尝造指南记里二车及欽器以献。又上莲花漏法，刻画不差，人服其精。立石载其法，工画，入妙品，尤善古木折竹。”由此来看，燕肃最大的贡献还是在发明方面。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中说：“燕肃是个达·芬奇式的人物。”

制成指南车。指南车亦称“司南车”，利用齿轮机构制成，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发明。据传指南车是黄帝时代发明的，到宋代它的制造方法已经失传，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对指南车内部构造记载较详细的是燕肃制造的指南车。

燕肃在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再度制成指南车，这些记录保存在岳珂（1183—1234年）的《愧郋录》和《宋史·舆服志》中，对燕肃指南车的内部构造、部件尺寸和制造方法记载详里。燕肃的指南车是一辆双轮独辕车，结构巧妙，新颖独特，车上立一木人，伸臂指南。车上除了2个沿地面滚动的车轮外，还有大小不同的7个齿轮。燕肃的指南车制作精美，车身涂为红色，上面绘制有青龙、白虎及花鸟图案，四角垂有香囊。该车的制造采用了差速齿轮的原理，这一应用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但是燕肃指南车的唯一缺点是，不能

转太大的弯。

制造记里车里程的“记里鼓车”。记里鼓车亦名“大章车”，也是利用齿轮机构制成的，是公元3世纪时中国最先发明的记录车里程的工具。大约在汉朝或晋朝已有记里鼓车，不过记载得较为简略。

燕肃重新设计了记里鼓车。燕肃的记里鼓车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一个木人，车行1里，木人击鼓；下层也有一个木人，车行10里，木人击钲。这种记里鼓车在部队行军和道路测量等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可见燕肃在技术上的表现十分惊人。

制造灌溉汲水用的“欽器”。欽器是先秦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发明的一种灌溉汲水用的陶器，是利用平衡的种类跟重心位置的关系制成，它“虚则欽，空则正，满则覆”，确实颇为巧妙，但是到宋朝时欽器已经失传。《东都事略》及《宋史》中的《燕肃传》都认为燕肃制造过欽器。

燕肃运用他掌握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利用重心和定倾中心的相对位置跟浮体稳定性的关系，经过周密的计算和精巧的设计，终于把欽器制造出来。这种欽器的形状类似陶罐，其系绳用的两耳，位于欽器腹靠下部的位位置，空的时候，其重心位置位于两耳之上，用绳悬挂时，欽器是倾斜的，方便打水；等水灌了半满的时候，由于重心降到两耳以下，欽器就自动直立起来；当水灌满的时候，由于重心升到两耳以上，欽器就很容易倾覆，便于把水从欽器中倒出来。

创制精确的“莲花漏”。刻漏为我国古时的计时器，始自周代，以后各代都有制作，至宋天圣时，唐制浮箭

刻漏尚存，然而却不能使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燕肃发明了精美的“莲花漏”，在漏壶中首次使用漫流系统，这是燕肃最实用的发明。当年九月，王立等检定莲花漏，试验结果与当时所用的“崇天历”不合，朝廷没有采用。后又经过多次试验，最终被朝廷采用。

与过去的漏壶相比，燕肃的“莲花漏”具有三大优点。第一，在漏壶中首次采用漫流系统，即在漏壶的上部开孔，使多余的水由此溢出，以此保持漏壶的水位恒定，基本上消除了漏壶水位变化对流量的影响；第二，根据不同节气、昼夜长短及不同的地区，分别制造刻度不同的48支浮箭，每个节气、昼夜各更换一个，以适应全年每日长短的差异；第三，首部刻有莲花的箭插入装在壶上的莲心，箭由于水的浮力穿过莲心沿刻线上浮，不致招摇。这些优点，提高了漏壶计时的准确度。燕肃的莲花漏被“世推其精密”，在宋代大行其道，被许多州所采用。

北宋时期大臣、文学家夏竦曾为燕肃的莲花漏作铭，称赞他的莲花漏“秒忽无差”。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作的《徐州莲花漏铭并序》也说：“以创物之智闻于天下，作莲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临必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虽然巧者，莫敢损益。”燕肃每到一处做官，都把莲花漏的制作方法以碑刻的形式进行介绍，并制成样品加以推广，这种乐于分享、热心传播技术的精神值得点赞。

研究海潮规律，发现海潮与月亮

是燕肃的重大贡献。古时候人们对潮汐这一自然现象并不了解，认为是“天河激流”或者“地机翕张”。燕肃为揭开这一自然现象之谜，研究了自古以来的海潮理论。他还利用在沿海州县做官的机会，在各地进行观察、试验，并对各地海潮进行分析、研究、比较，先后用大约10年的时间，足迹遍及东南沿海。他曾走进廉州（今广东合浦）、雷州（今广东海康）、化州（今广东化州）、恩州（今广东阳江）、广州、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安）、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调研，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通过实地调研，燕肃明确提出了日月的作用是海潮的成因，并指出在一月之中朔望时期潮大，上下弦时期潮小，这些论断是科学正确的。燕肃是潮汐研究史上第一个提出具体潮汐时差数值的人，通过对潮候进行推算，指出每天海潮涨落的时间，其所举数据是非常精确的。他还抓住了泥沙堆积、河床升高等关键问题，第一个比较科学地解释了钱塘江潮。

乾兴元年（1022年），燕肃写出了著名的论著《海潮论》。《海潮论》虽刻在石碑上，却未曾留下名字，经过他人考证才知道是燕肃的著作。此外，燕肃还根据自己的海潮理论绘制了《海潮图》，为当时的渔业生产和海上交通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